

学 · 术 · 动 · 态

中文系师生开展对“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批判

最近，中文系师生召开了一次科学讨论会，对邵荃麟同志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批判。

会上首先剖析的是：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是什么性质的创作方法，它与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有什么关系？发言的同志认为邵荃麟同志在“现实主义深化”理论中，提倡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写“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写“阴暗心理”，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翻版。

邵荃麟同志提倡写“阴暗心理”，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实际就是提倡写“精神猥琐”、“内心分裂”的人物，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贯特点、一贯手法。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包括它的一些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以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描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人物内心矛盾，则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深刻表现。可是，邵荃麟同志所继承的，所崇拜的，还不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般东西，而是它的特别有害的部份。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上。邵荃麟同志以前曾经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译后记》里，对这位作家的作品表示了抑制不住的激情，他甚至“有时沉没到这小说的世界中间，为它战慄，为它流泪。”一九五六年这本书再版时，邵荃麟同志在《再版后记》里，再一次称讚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人类痛苦的杰出艺术才能”，称他的作品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意义”。邵荃麟同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由此可见。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高尔基所说，是一位“有毒的天才”。他的作品以写人的内心矛盾见长，其主人公多半具有“二重人格”。这在当时就有消极的影响，对于今天的读者，危害性更大。我们是绝不能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的。但是，邵荃麟同志不仅向人们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且极力鼓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要求作家描写人们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心矛盾。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过程，不是精神解放的过程，不是思想上积极性革命性不断高涨的过程，而是内心不断矛盾冲突的痛苦过程，是“苦难

的历程”。且以这样的阴暗思想评价作品，对那些描写“内心分裂”、“精神负担”的作品，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显然，邵荃麟同志的现实主义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邵荃麟同志把描写落后人物的作品（实际是美化旧事物反对新事物的作品）推崇备至，且把人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造过程中的精神解放过程，看成是“痛苦”与“苦难”，这也正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用旧事物反对新事物。

会上对邵荃麟同志提倡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进行了剖析。参加讨论的同志从分析邵荃麟同志所推崇的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的“矛盾”入手，剖析了“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身上的“矛盾”到底是一种什么矛盾后，指出：邵荃麟同志所说的“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就是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就是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至于他们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就是夹在互不相容的两条道路中间，要观望而又不能长期观望；要徘徊而又没有徘徊余地。这种人，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人物。大写这种人物，大写这种矛盾，不但不能深刻反映现实斗争，而且必然会歪曲现实斗争。因为我们的现实斗争的目的和内容，就是“兴无灭资”，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的文艺要描写这种斗争，就必须大力描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表现他们改造世界的伟大理想和战胜资本主义、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实践。邵荃麟同志要大写落后人物，就势必排挤英雄人物，抹杀现实矛盾斗争中属于主导地位的英雄人物变革现实的伟大作用，并且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都写成是“矛盾错综复杂”的落后人物，把人民群众写成是不想革命，不拥护社会主义，这就是从根本上歪曲了我们的光辉现实。至于写英雄人物，也要写成同“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一样，内心如何盘算着私利，在革命斗争面前如何矛盾、彷徨、忧郁，这实际是把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心理，硬装到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身上，抹煞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抹煞社会主义革命中最积极的力量。由此可见：提倡大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就是要我们的文学创作在人物塑造上，不去描写革命英雄和革命的人民群众，而去大力描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从而使我们的文学不去表现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力量，而去大力表现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力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力量，是违背时代发展趋向而正在衰亡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说有“现实性”的话，那也只不过是落后的、反动的“现实性”。邵荃麟同志把反动的“现实”，当成真正唯一的“现实”，认为表现了它才有“现实主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社会现实，都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进行斗争，革命阶级终将战胜反动阶级的过程。因此，只有革命阶级的力量，才能代表现实斗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才是最有“现实性的”。

邵荃麟同志主张作家在创作中，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他说：“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过去的社会问题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讨论会上，大家认为邵荃麟同志的这个“现实主义深化”论点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做法。所谓“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鲜明的态度。”它的实质是抛弃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取消社会主义文学的革命灵魂。因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文学成为总的革命事业的一部份，这就决定了作家在观察、表现生活时，必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事实上，任何作家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说话，表示着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而无产阶级作家，为革

命政治服务应当更自觉,态度更鲜明。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作家反对什么、拥护什么,态度必须鲜明。采取消极态度,只能使资本主义的东西得到泛滥,使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受到压抑。所谓不表示鲜明的态度,正是采取这种消极态度,站到资本主义旧事物一边,削弱和压抑社会主义新事物;是要把文艺从积极地反映现实和推动现实、变革现实的正确道路上,拖上消极地、被动地暴露现实的邪路上去;要作家不从塑造革命英雄形象、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这一重大任务出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歌颂新生事物,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所谓“问题人物”,即落后人物身上,去渲染这些人物的落后的精神状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而是新生的社会主义。作家不去以最大的热情,为社会主义鸣锣开道,大写特写代表时代主流的革命英雄,不表现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伟大力量,就是壮资本主义声势,灭社会主义威风。这种作品,只能对群众起瓦解革命斗志,动摇社会主义信心的消极作用,只能从思想上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准备条件,开辟道路。至于邵荃麟同志要我们模仿“过去的社会问题剧”,则完全是使我们的文学变成资产阶级“暴露文学”。社会问题剧的创始者是易卜生。他的主要创作时期在十九世纪后期。这时资产阶级已经走到没落时期。易卜生大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生活中的矛盾,但不能提供正确的解决。他说:“我只管提问题,答案我可没有”。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个天才的问号‘?’”,没有答案的问号,没有解决的疑问”,是“被他当时社会制度里的矛盾所吓坏了的、弄慌了的。”并且易卜生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来揭露现实,所以不仅不能指出正确的道路,甚至有时还表现了反人民群众的倾向。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出现了“问题派”的剧本,出现了“问题小说”,这就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家,打着“为人生”的旗号,探索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结果。他们由于思想立场的局限,同样得不出正确的答案,而且他们的为人生,是为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为社会的人生。其实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作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提出问题,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刻反映现实,指出斗争的方向和前途,这就已经不能很好地配合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起促进作用。今天邵荃麟同志还要沿袭这种创作方法,就是要我们走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老路,使我们的文学成为暴露和批判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

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些同志还就邵荃麟同志拿来作为“现实主义深化”标本的《赖大嫂》作了剖析。认为《赖大嫂》严重地歪曲了社会主义农村的真实生活,歪曲了广大农民形象,由此可见邵荃麟同志的“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实质也就是歪曲社会主义农村,歪曲贫下中农英雄形象的理论。由于时间关系,这次讨论对一些问题的剖析与批判还未深入展开。中文系师生,今后还准备就革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现实主义深化”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对立等问题,对“现实主义深化”理论作进一步的剖析和批判。

(罗立乾)